

再论扬雄《反离骚》

赵 乖 勋

(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, 成都 610068)

摘要:有些学者仅从扬雄的道家思想或爱屈原的角度分析《反离骚》,须商榷。实际上,扬雄把人的行为目的和方法分开,对屈原行为方法不满,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:不应绝对不从俗,不用“以退为进”的策略,不识“时”。此外,他又赞扬屈原爱国之情和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。这些观点为个体的自由发展拓展了空间,体现了扬雄思想中的闪光点。

关键词:扬雄;屈原;《反离骚》

中图分类号:I206.2 **文献标志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0-5315(2010)06-0121-05

扬雄为什么作《反离骚》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,一般有两种不同的意见。宋代朱熹认为《反离骚》就是反屈原:“雄固为屈原之罪人,而此文乃《离骚》之谗贼矣。”^{[1]237}清代刘熙载在《艺概·赋概》中表现了类似的想法:“班固以屈原为露才扬己,意本扬雄《反离骚》。”^{[2]88}明代胡应麟在《诗薮·杂编》卷一中提出“爱原”说:“扬子云《反离骚》,盖深悼三闾之沦没,非爱原极切,不至有斯文。”又云:“扬子云《反离骚》,似反原而实爱原。”^{[3]241}明末,李贽在《焚书·读史》中又发展了胡应麟的观点:“《反骚》,反其辞,以甚忧也,正为屈子翻愁结耳。”^{[4]198}

近代学者从不同角度继续深入讨论,澄清了许多问题。但是,如果结合相关作品综合考虑,有些看法仍须商榷,兹略举二例。其一,许多学者认同“爱原”说,常引用李贽的观点,却没有注意到扬雄曾明确地表示自己与屈原不同。《古文苑》卷四引《太玄赋》云:“屈子慕清,葬鱼腹兮。伯姬曜名,焚厥身兮。孤竹二子,饿首山兮。断迹属娄,何足称兮。辟斯数子,智若渊兮。我异于此,执《太玄》兮。”^{[5]601}“我异于此”,就是说与屈原不同。《法言·吾子》说屈原“如玉如莹,爱变丹青。如其智!如其智!”^{[6]57}卫仲

璠先生考证“如其智”含义为“怎么能算得明哲啊!”^{[7]36}这不全是褒扬。李大明先生也有类似看法:“他(扬雄)认为屈原‘智’,但他又不赞成屈原的行为,不愿意、也不可能学习屈原的为仁义忠贞而殉身的行为。”^{[8]227}其二,徐复观先生认为扬雄“写《反离骚》、《逐贫赋》、《解嘲》等作品时的思想底子是老子”^{[9]321}。很多学者喜欢用道家思想来分析《反离骚》,却忽视了创作时间。这三篇作品创作的时间、背景都不同。《解嘲》作于汉哀帝时,“丁、傅、董贤用事……或嘲雄以玄尚白,而雄解之,号曰《解嘲》”^{[10]3565-3566}。这时扬雄对政局不满,认为他的思想基础是道家,也合理。写《逐贫赋》已到了王莽执政时期,那时“家素贫,嗜酒,人希至其门”^{[10]3585}。在这暮年穷愁之际,扬雄可能有道家思想。

然而,“《反离骚》作于成帝阳朔(前 24 年—前 21 年)中,时扬雄 30 岁多一点,居于蜀中”^{[8]223}。这时,他还未仕;出仕后还能积极参与政治,创作了具有讽谏意义的《甘泉赋》等作品。未仕前,他思想的主导方面不应是道家思想。虽然他曾跟从严君平游学,严氏信奉老子。但二者的思想差异也很明显:扬雄求名,他“仕京师显名”^{[10]3056};严氏求自适,“可见

收稿日期:2009-11-12

作者简介:赵乖勋(1968—),男,陕西宝鸡人,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。

而不可得也”^{[10]3057}。扬雄仕后积极参与政治。他出仕于成帝时期,班固《汉书·成帝纪》对成帝的评价是:“湛于酒色,赵氏乱内,外家擅朝,言之可为于邑。建始以来,王氏始执国命,哀、平短祚,莽遂篡位,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!”^{[10]330}成帝时,外戚开始专权,但势力尚未十分强大,还有可能扭转局势。扬雄也频频从事政治活动。对于成帝的缺点,他多次讽谏。成帝好酒,扬雄作《酒赋》以谏:“子犹瓶也。观瓶之居,居井之湄。处高临深,动常近危。酒醪不入,藏水满怀。不得左右,牵于缠徽。一旦击碍,为甕所輻,身投黄泉,骨肉为泥。”^{[11]卷七百五十八,3365}如果他思想的主导方面是道家,不会用这样尖刻的语言劝说皇帝。《太平御览》卷三百八十六引他在成帝时作的《蜀王本纪》,记载了蜀王沉溺于女色的传说,其结果是悲剧,不能说与现实无关。他的《羽猎赋》等辞赋直接针对皇帝的错误进行讽谏。《河东赋》大胆告诫成帝:“临川羨鱼,不如归而结网。”^{[10]3535}他上《甘泉赋》,劝皇帝不要过分奢侈。抓住一切机会讽谏皇帝,这与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不大一致,认为这时他的思想以道家为主,应进一步商榷。人的思想一般逐渐变化,扬雄青年时期作《反离骚》,也不会以道家思想为主导。如果真是这样,他很可能和严君平一样不出仕,或者像晚年那样很少参与政治。可见,我们有必要重新分析《反离骚》。

一 屈原和扬雄观察事物的不同

把屈原和扬雄的言行比较一下,我们会发现两人观察事物的立足点不同。屈原看重行为目的,认为自己对楚王很忠诚。在《离骚》中,他说,“指九天以为正兮,夫唯灵修之故也”^{[12]9};在《九章·惜诵》中说,“所作忠而言之兮,指苍天以为正”^{[12]120},“思君其莫我忠兮,忽忘身之贱贫”^{[12]123}。他反复陈述自己行为目的很善。似乎只要楚王能理解这一点,什么问题都能解决。别人不理解时,他常以目的纯正来安慰自己。《离骚》云:“苟余情其信婞以练要兮,长顛颡亦何伤?”^{[12]12}《九章·涉江》云:“苟余心之端直兮,虽僻远之何伤?”^{[12]130}“余将董道而不豫兮,固将重昏而终身!”^{[12]131}在屈原看来,行为目的是否善很重要。

和屈原不同,扬雄很重视行为的方法,认为把同一种方法在不同条件下,其结果不同。《太玄·毅》云:“次二,毅于心腹,贞。《测》曰:毅于心腹,内坚刚也。”司马光注:“君子守正坚刚不可夺也。”^{[13]62}君子

能“毅然敢行”是好事,因此说“贞”。《毅》又云:“上九,豨毅其牙,发以张弧。《测》曰:豨毅其牙,吏所猎也。”司马光注:“小人极毅以取祸,如豕毅其牙,适足自招射猎而已。”^{[13]63-64}似乎君子应守正,应该“毅”;而“小人极毅”只招祸。如果认为君子任何时候都要“毅”,而小人不能这样,显然不对。我们只能认为,有的情况下可以“毅”,有的条件下不能“毅”。由此可见,扬雄很重视行为的方法:同一种方法应随条件而变化。《太玄》大部分内容讨论做事的方法。

当然,扬雄也认为目的不正确必得祸。《太玄·僊》云:“初一,冥贼僊天,凶。《测》曰:冥贼之僊,时无吉也。”司马光注:“小人包藏祸贼之心,必受其殃。”^{[13]41}《翕》也有类似的思想:“初一,狂冲于冥,翕其志,虽欲稍摇,天不之兹。《测》曰:狂冲于冥,天未与也。”司马光注:“小人有不善之心,狂荡冲击于冥昧之中,翕敛其志,未形于外”,“虽欲纵释其志,天未之与,不得滋长也”^{[13]122}。“小人有不善之心”,“天未之与”,目的不正确,就没有好结果。

扬雄把行为目的和方法清楚地分开,在目的正确的条件下,探索恰当的方法,拓展了个体自由发展的空间。在《反离骚》中,他用这种观点来评价屈原。当然,《太玄》是他晚年之作,但其中的思想不是一蹴而就的,青年时就有这种思想的萌芽。

二 扬雄不满意屈原的行为方法

扬雄对屈原并不满意,认为他方法不够恰当。

首先,屈原绝对不从俗,不够正确。

《离骚》云:“謇吾法夫前修兮,非世俗之所服。虽不周于今之人兮,愿依彭咸之遗则。”^{[12]13}《离骚》作于前期,此时屈原还未充分认识到不肯从俗的缺陷,到了后期就不同了。《九章·涉江》云:“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,固将愁苦而终穷。”^{[12]131}如果不从俗,只能“愁苦而终穷”。多次受挫之后,情况又变了。《九章·思美人》云:“欲变节而从俗兮,媿易初而屈志。独历年而离悯兮,羌冯心犹未化。”^{[12]147}我们从“欲变节而从俗兮”,可以看到屈原也有犹豫和彷徨,其中蕴含着不少不幸。

绝对不从俗给屈原带来一系列不幸,把他推向孤困之地,是他最终走上“湛身”^{[10]3515}之路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屈原曾说“行不群以巅越兮”,认识到失败的一个原因是孤立无援;也体会到自己“事君而不贰兮,迷不知宠之门”^{[12]123},甚至到了“愿陈志而无路”^{[12]124}的地步。可是他没有认识到绝对不从俗是

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，却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发展。《九章·抽思》云：“望三五以为像兮，指彭咸以为仪。”^{[12]138}《橘颂》云：“独立不迁，岂不可喜兮？”^{[12]154}这种追求使屈原更加孤立。《抽思》云：“忧心不遂，斯言谁告兮。”^{[12]141}《思美人》云：“惜吾不及古之人兮，吾谁与玩此芳草？”^{[12]148}在这孤立困境中，屈原动而见尤。《惜往日》云：“愿陈情以白行兮，得罪过之不意。”^{[12]152}《哀郢》云：“兹历情以陈辞兮，荪详聋而不闻。”^{[12]138}这时才感到“终危独以离异兮，曰君可思而不可恃”^{[12]124}，最终走向绝境。《怀沙》云：“知死不可让兮，愿勿爱兮。”^{[12]146}《惜往日》云：“宁溘死而流亡兮，恐祸殃之有再。”^{[12]153}从屈原的言行可以看出，由于绝对不从俗，屈原陷入困境，一步步走向“湛身”。

屈原自豪的是“纷吾既有此内美兮，又重之以修能”^{[12]34}，他希望流芳百世，担心事业不成功。《离骚》云：“老冉冉其将至兮，恐修名之不长。”^{[12]112}又云：“汨余若将不及兮，恐年岁之不吾与。”^{[12]6}“湛身”牺牲了内美，事业也无望。因此扬雄在《反离骚》中极其沉痛地说：“昔仲尼之去鲁兮，萋萋迟迟而周迈，终回复于旧都兮，何必湘渊与涛濑！”^{[10]3521}他为屈原“湛身”而伤心。

由于绝对不从俗，屈实用难以企及的标准来要求别人，从而失去了同盟。从《离骚》“求女”中一个细节可以看到这一点。屈原想求“有娥之佚女”，要找合适的媒人，“吾令鸩为媒兮，鸩告余以不好。雄鸩之鸣逝兮，余犹恶其佻巧”^{[12]33}。王逸注：“我使鸩鸟为媒，以求简狄，其性谗贼，不可信用，还诈告我言不好也。”“又使雄鸩衔命而往，其性轻佻巧利，多语言而无要实，复不可信用也。”^{[12]33}这让人感到屈原苛求于人：即使鸩鸟“性谗贼”，而雄鸩的确愿意协助，是好事，他却嫌其“多语言而无要实”。雄鸩为媒并无结果，就断定其“不可信用”，似乎别人总不如意。再看事情的发展：“心犹豫而狐疑兮，欲自适而不可。凤凰既受诒兮，恐高辛之先我。”王逸注：“己令鸩为媒，其心谗贼，以善为恶；又使雄鸩衔命而往，多言无实。故中心狐疑犹豫，意欲自往，礼又不可，女当须媒，士必待介也。”“己既得贤智之士若凤皇，受礼遗将行，恐帝誉已先我得娥简狄也。”^{[12]33-34}屈原要“得贤智之士若凤皇”，而现实中没有这样的贤士；雄鸩愿往，又嫌其有缺点，结果“求女”失败。纵观全过程，归根结底，失败的原因是屈原嫌雄鸩“多

言语而无要实”，“不可信用”，失去了支持者。

鉴于此，扬雄在《反离骚》中十分遗憾地说：“抨雄鸩以作媒兮，何百离而曾不壹耦！”^{[10]3521}为什么屈原总是找不到恰当的同盟者？其原因是对别人要求过高，失去盟友。这不是偶然情况。他“滋兰九畹”，“又树蕙之百亩”^{[12]10}，对“兰”、“蕙”的态度是：“虽萎绝其亦何伤兮，哀众芳之芜秽。”^{[12]11}他只哀其“芜秽”，他要求每个人都像自己那样品德高尚，不顾个人得失。求简狄不成，又求二姚。他又认为“理弱而媒拙兮，恐导言之不固”^{[12]34}。似乎只有理强而媒巧，“求女”才能成功。这些都是很高的要求，当时难以实现，故支持者甚少。他的要求一般难以达到，因此扬雄在《反离骚》中惋惜地说：“驰江潭之泛滥兮，将折衷虞重华。舒中情之烦或兮，恐重华之不累与。”^{[10]3519}舜也感到这样的条件可望而不可及，故不赞许。也许朱熹看到这一点，才说：“夫屈原之忠，忠而过者也。”^{[1]243}所谓“过”，大概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吧。冯小禄先生说“屈原式的决绝、清洁人格在汉代已被现实证明不具备操作的践履性”^{[14]133}，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。

《太玄·守》提出了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：“初一，闭朋牖，守元有。《测》曰：闭朋牖，善持有也。”司马光注：“能闭外类之诱，守其始有之性者也。”^{[13]119}即人要排除外界影响。屈原不从俗，排除外界影响，是正确的。《守》又云：“次五，守中以和，要侯贞。《测》曰：守中以和，侯之素也。”司马光注：“守中和之道以要约诸侯，诸侯之所取正而归向也。”就是说，要“守其始有之性”，也要“守中和之道”。屈原不从俗，也要中和，不能过度。如果过度，就变成另一种情况。《守》云：“次六，车案轳，圭璧靡。《测》曰：车案轳，不接邻也。”司马光注：“执守失贞，不接邻国，车轮按轳以靡行，圭璧生麈而不用”，“自守太过者也”^{[13]120}。自守过度就“失贞”，无益。

其次，屈原没有采用“以退为进”的策略。

“以退为进”^{[6]512}就是在目标不变的前提下适当退缩，以求更快地进取。扬雄强调“以退为进”不能改变既定目标。故《法言·问道》云：“川虽曲而通诸海则由诸。”^{[6]110}《法言·五百》又云：“拙身，将以信道也。”^{[6]249}

“以退为进”有两大优点。首先可以积蓄力量。自己的力量弱小就要适当退却。《太玄·奕》云：“初一，赤弁方锐，利进以退。《则》曰：赤弁方锐，退以动

也。”司马光注：“萌芽之生，必先勾屈，如君子退让而身益进也。”^{[13]39}草木初生时先屈其芽，自己力量小时就要适当退让。如果勉强进取，效果不佳：“独守逝逝，利小不利大。”^{[15]32}郑万耕注：“一人独进，不求人助，小事尚可，事大则危。”^{[15]34}“以退为进”可以得到众多支持者。屈原知进不知退，扬雄在《反离骚》中很遗憾地说：“知众媮之嫉妒兮，何必扬累之蛾眉？”不“扬蛾眉”，就有适当退却之意。如果屈原能进退自如，就可能保全其身：“亡春风之被离兮，孰焉知龙之所处？”^{[10]3518}“以退为进”可以寻找恰当的进取机会。退却以待对立势力变衰，可能会找到进取的有利时机。《太玄·去》云：“求我不得，自我西北。《测》曰：求我不得，安可久也。”^{[15]197}郑万耕注：“我指阳气”，“西北方，阴气极盛，阳气极衰，阳气不再发生作用”，“然盛极而衰，阴极阳生，阴气开始走向衰落”^{[15]199}。即使对立势力很强盛，也包含着否定因素，可以利用否定因素，促进事物向对立面发展。《锐》云：“次八，锐其锐，救其败。《测》曰：锐其锐，恐转作殃也。”司马光注：“君子见得而思义，瞻前而顾后，虽锐其锐，而常救其败失，故免于殃咎也。”^{[12]34}扬雄告诉人们要防止事物发展到对立面。相反，我们可以促使对立势力“锐其锐”，尽快达到极盛。《盛》揭示了由盛转败的规律：“上九，极盛不救，祸降自天。《测》曰：极盛不救，天道反也。”^{[13]80}对立势力由盛转衰，正是进取的有利时机。屈原没有应用“以退为进”的策略，所以扬雄在《反离骚》中很惋惜地说：“芳酷烈而莫闻兮，不如褻而幽之离房。”^{[10]3518}他认为屈原不该只表现自己的“芳”，也要适当退让。屈原羡慕傅说，却没有认识到傅说能“以退为进”：“傅说抱道怀德，而遭遇刑罚，操筑作于傅岩。”^{[12]38}因此扬雄在《反离骚》中说：“累既攀傅说兮，奚不信而遂行？”^{[10]3520}

再次，屈原不识“时”。

“时”又分为时势和时机两方面。从时势来看，楚怀王、顷襄王都昏庸无能。此时，屈原应该隐退。扬雄多次陈述了乱世隐退的思想。《法言·问明》云：“治则见，乱则隐。”^{[6]194}又云：“时来则来，时往则往。”^{[6]208}《法言·问神》云：“时飞则飞，时潜则潜，既飞且潜。”^{[6]141}屈原也感到“阴阳易位，时不当兮”^{[12]132}，却不愿退隐。扬雄则认为“君子得时则大行，不得时则龙蛇”^{[10]3515}，见“枳棘之榛榛兮”应“拟而不敢下”^{[10]3517}。从时机来看，屈原不能预见事物

发展趋势，防患于未然。扬雄认为，能预见事物发展趋势是“智”的重要内容之一。“玄”的作用在于能使人“先知”：“晓天下之曠曠，莹天下之晦晦者，其唯玄乎！”^{[13]185}《法言·先知》云：“先甲一日易，后甲一日难。”注：“甲者，一旬之始也，已有之初也。先一日，未兆也；后一日，已形也。夫求福于未兆之前易，救祸于已形之后难。”^{[6]285}《法言·寡见》云：“用智于未奔沈。大寒而后索衣裘，不亦晚乎？”^{[6]239}屈原不知预见事物发展趋势，扬雄在《反离骚》中痛惜地问：“灵修既信椒、兰之媠俊兮，吾累忽焉不蚤睹？”^{[10]3517}

扬雄探索的众多方法，为个体的自由发展提供更大的可能性，但是这种探索仍有局限性。因此扬雄多次强调人在“命”面前无能为力。《法言·问明》云：“命者，天之命也，非人为也，人为不为命。”《问明》又云：“命不可避也。”^{[6]189}《太玄·玄攤》云：“时与不时者，命也。”^{[13]186}《法言·修身》提出对待“命”的正确态度应是：“乐天知命。乐天则不勤，知命则不忧。”^{[6]88}在《反离骚》中扬雄说：“夫圣哲之(不)遭兮，固时命之所有”^{[10]3521}；“遇不遇命也，何必湛身哉！”^{[10]3515}如果屈原认清这一点，也不会“湛身”。

从行为的方法来看，朱熹认为《反离骚》就是反屈原，有一定的道理。令屈原疑惑的是自己“忠何罪以遇罚”^{[12]123}，在《反离骚》中，扬雄作出了答案：屈原做事方法不恰当。此后，扬雄不断探索，力图解决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：在专制统治不断加强的情况下，个体如何自由发展。如果说《反离骚》是这种探索的开始，那么《太玄》是其基本完成。

三 扬雄赞扬屈原的行为目的

从行为目的来看，扬雄热情赞扬屈原。扬雄很敬佩屈原的爱国热情，因为他自己也依恋汉室。《汉书·匈奴传》载其《上书谏勿许单于朝》，虽作于晚年，但依恋汉室之情毕现：态度诚恳，防患于未然。《赵充国颂》(载《文选》)、《州箴》12篇和《官箴》25篇(俱载《古文苑》)都渗透着这种感情。哀帝时西汉王朝已经岌岌可危，扬雄仍然趁皇帝问灾异的机会，陈述自己的用人建议：“朱博为人，强毅多权谋，宜将不宜相，恐有凶恶极疾之怒。”^{[10]429}这是正确的建议，因为“博本武吏，不更文法”^{[10]3399}。他用连珠表现自己的忧国之情。《艺文类聚》卷五十七引扬雄《连珠》云：“明君取士，贵拔众所遗；忠臣荐善，不废格之所排。是以岩穴无隐，而侧陋章显也。”^{[16]1036}《太平御览》卷四六八引扬雄《连珠》云：“吏不苟暴，役赋不

重,财力不伤,安土乐业,民之乐也。”^{[11]2153}看到琴也联想到治国之道:“舜弹五弦之琴而天下治,尧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也。”^{[11]421}徐复观先生说:“《太玄》中依然反映出他对当时政治问题的批评”^{[9]333};“《法言》中有的话,是反映当时现实的”^{[9]336}。这些都体现其依恋汉室之情,因而他推崇具有爱国思想的屈原。

扬雄推崇具有顽强意志的人。在《法言·渊骞》中,他赞颂孟子:“勇于义而果于德,不以贫富、贵贱、死生动其心,于勇也,其庶乎!”^{[6]419}他推崇具有这种精神的张骞、苏武:“张骞、苏武之奉使也,执节没身,不屈王命,虽古之肤使,其犹劣诸!”^{[6]482}在《法言·问明》中,他赞扬具有这种精神的严君平:“久幽而不改其操,虽随、和何以加诸?”^{[6]200}屈原为理想不断奋斗,扬雄当然敬仰。因此郭建勋先生只分析《反离骚》中与屈原关系密切的语汇就发现:“扬雄的《反离骚》不仅肯定了屈原,而且对这位伟大诗人作出了高度的评价。”^{[17]95}这方面的论述较多,不再赘述。

纵观扬雄一生,他在政治上没有多少突出贡献。其思想却颇有特色:在不改变行为目的的前提下,他积极探索个体自由发展的具体途径。在《太玄》中,他系统地讨论了行为的方法。《太玄》实际上是一部方法论专著,拓宽了个体自由发展的空间。扬雄坚持两点:目的正确,个体自由。这些表现在《太玄赋》中,既“怀忠贞以矫俗”^{[5]600},又“荡然肆志,不拘挛兮”^{[5]601}。他认为君子应该“旁明厥思”,“旁通厥德”^{[6]211},“应万变而不失其正”^{[6]212}。他认为“玄”可贵之处在于能“知明知晦”,“无所系轲”^{[13]186},自由自在。这些正是扬雄思想闪光之处。许多学者也看到了这一点:许结先生认为《法言》中的人物评品“衬托出作者蕴蓄于心灵奥区的个性意识的觉醒”^{[18]173};王玫先生说“扬雄是汉代文人中保持较多个人自由意识和独立个性者之一”^{[19]19};郭建勋先生确认《反离骚》寄寓着扬雄“对自由选择、独立人格的某种模糊的向往”^{[17]98}。这些论述,值得重视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朱熹. 楚辞集注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9.
- [2]刘熙载. 艺概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8.
- [3]胡应麟. 诗薮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58.
- [4]李贽. 焚书 续焚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- [5]古文苑[G]//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:1332册. 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6.
- [6]汪荣宝. 法言义疏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7.
- [7]卫仲璠.《扬子法言》论屈原章析义[J].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(人文社科版),1985,(2).
- [8]李大明. 汉楚辞学史[M]. 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4.
- [9]徐复观. 两汉思想史[M]. 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1.
- [10]班固. 汉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
- [11]李昉. 太平御览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60.
- [12]洪兴祖. 楚辞补注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3.
- [13]司马光. 太玄集注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98.
- [14]冯小祿. 从模拟论扬雄《反骚》的范式意义[J].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,2003,(3).
- [15]郑万耕. 太玄校释[M]. 北京: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1989.
- [16]欧阳询. 艺文类聚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9.
- [17]郭建勋. 扬雄及其《反离骚》之再认识[J]. 求索,1989,(4).
- [18]许结. 论扬雄与东汉文学思潮[J]. 中国社会科学,1988,(1).
- [19]王玫. 论扬雄[J]. 中国典籍与文化,2001,(2).

[责任编辑:唐 普]